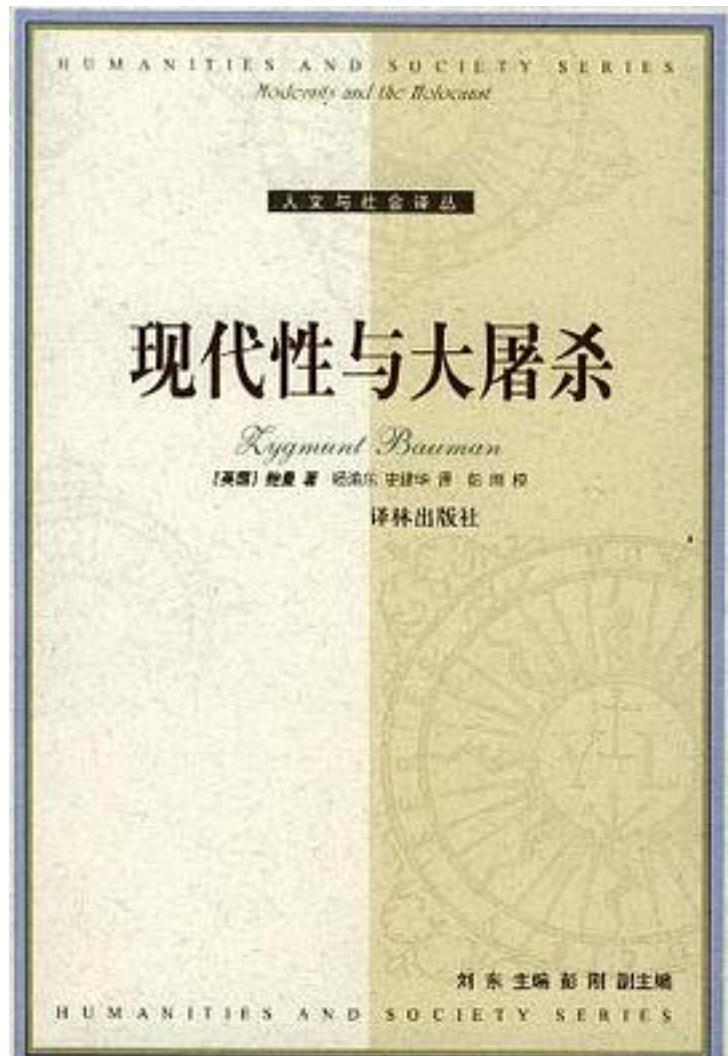


# 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与大屠杀\_下载链接1\_

著者:[英]齐格蒙·鲍曼

出版者: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

装帧:

isbn:9787544715805

##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L.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G.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 前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

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 bowed to the ground) 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

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 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 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Winter 1988—9, p.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

、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 *Winter in the Morning*), 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 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ch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作者介绍：

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78)、《阶级记忆》(1982)、《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及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目录:	前言
一	导论: 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 (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 (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
现代防卫的破产.....
...
结论.....
...
<b>五</b>
诱使受害者合作.....
...
“封锁” 受害者.....
...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 游戏.....
...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
自我保全的理性.....
...
结论.....
...
<b>六</b>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
...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
技术的道德化.....
...
自由漂浮的责任.....
...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
罪恶的社会性质.....
...
<b>七</b>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
大屠杀的挑战.....
...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
距离的社会生产.....
...
结束语.....

...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 • • • • (收起)

[现代性与大屠杀](#) [下载链接1](#)

## 标签

社会学

现代性

齐格蒙鲍曼

哲学

政治学、人类学与社会科学

鲍曼

批判理论

社会

## 评论

于是，我通过本书理解了那些团委、学生会的渣渣

---

垃圾翻译，狗屁不通，尤其前四章，翻译你摸着良心说，这读起来是人话吗？

鲍曼作为“后现代”思想的重要开创者，其思路自然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此书的精髓，乃在于总结出了现代极权主义政治通过官僚科层机构，可以达成任何非人的行动而不负有道德责任。弊处也很明显，尽管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都是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但一种“看透了”的心态，要弃绝整个现代性，则是颇不可取。鲍曼看来，现代性就是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孕育状态。要走出来，就不能信任机构组织、理性。从反对理性主义崇拜、科学主义的角度，鲍曼此说不错。但他弃绝整个现代性，弃绝理性，弃绝现代组织的可能，对前现代进行辩护，认为前现代所谓“自然而然”的人之关系才是好的。这些想法，其实非常有害——尤其对于中国大陆的语境。

2017第58本，大屠杀的产生有赖于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有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替代了道德责任，有效掩盖了道德行动的道德意义；区隔和隔离的技术使人们淡漠那些应当受到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刺激而反应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

大屠杀能够发生，并非反犹主义，而是理性的文明社会，是无上的科学，是高效的官僚体系。前现代的群众暴力固然可怕；但现代社会的全面冷漠更让人毛骨悚然。极权政府园丁让群众生活在无杂音，无武力的环境中，也意味着所有的暴力皆集中于威权。犹太人被步步剥夺作为人的资格，民众出于利益考量而缄默。对于官僚，道德是确保犹太人能全数运送到毒气室；对于科学家，道德是优化毒气室工艺。技术遥控使受害者无名化，消除了杀戮从事者的道德负担。我思考赫希曼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驯化了欲望。然而利益考量也削弱了道德力量，使我们纵容暴行的发生。尤其在中国，一个拒斥多元化的国度，没人知道盛世之下潜藏着什么。道德不能消亡，必须牢记列维纳斯的话，“我们为一切负一切责任，在一切人之前为一切负责，而我的责任超过了其他一切人。”

作者说的现代性，大致是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意思；作者说的后现代主义才是市场经济；作者说的理性，大致是功利主义的意思；作者说的社会，好多地方都是指国家……

实际上鲍曼还是犯了《流动的现代性》中重复啰嗦、论据不足的毛病，但仍具有反思的高度和一贯的想象力。关于犹太人的处境演变（或者是种族/反犹主义的演变）部分甚佳，是基于史料的足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进入后对关涉官僚及其导致的“拯救你能所能拯救者”的道德豁免感之批判，需要结合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身份加以审视，即是说，既对反思现存制度帮助但需认识到当中的激进。于我，整本书的高度，很大部分来自于鲍曼在强调“大屠杀”的可理解性，而非对现代性的批驳（尽管这两者难以剥离）。对可理解性的强调展现了鲍曼与身份认同相对抗过程中，产生的令人尊敬的智性。过于批驳现代性亦是硬币的两面，要认清中西不同的社会语境。前半段翻译束手束脚，难以施展，阅读体验也不佳；后半段得到施展，却失去了行文的流畅。

2017年已读118：鲍曼将大屠杀置于现代化背景之下，反思现代化与大屠杀的关联、大屠杀何以发生以及大屠杀中的道德缺席等一系列论题。诚如作者所说：“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大屠杀是现代化的技术成就，也是官僚体系的组织成就。而关于大屠杀中道德冲动的沉寂与道德自抑的悬置，倒可以和阿伦特对照着看，它阐释了“平庸的恶”何以成为可能，但对鲍曼和阿伦特一再强调的思考与道德的完全缺席，我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一点可以参看《奥斯维辛》中纳粹行凶者的自述。另外，鲍曼虽然反驳了阿伦特提出的“如果没有犹太委员会与纳粹的合作，受害者的数量将会减少”这一论点，但也并不否认正是犹太委员会为纳粹提供了诸如管理、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委员会在其中的腐败。翻译有点佶屈聱牙，译者很喜欢用各种多定语长句，扣一星。

道德是施之于见闻之所及。 ps, 中译本句子太长，结构过于复杂。

二十世纪留给我的亲身感受是，不要用你的生活体验来揣测国家机器的所作所为，对于普通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生活体验可能只是巧克力配额提高。反过来说，当看到一车厢尸体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至少上百万人死于非命，世界在我们的视界之外会造成巨大的放大倍率。

对工具理性，官僚体系，社会距离的置疑，用批判理性、社会交往的道德律令来解决。感觉有点不怎么对症下药啊。另，鲍曼的文笔不错，适合写散文。

没有以为的那么难懂，确实比以为的那么难读。翻译的句子不太像中文，很硬，而且后面道德章节，罗里吧嗦，重复赘述的厉害。前面引人入胜了，从现代技术、官僚、道德的多角度来看大屠杀的可行性，但是沉默的大多数德国人是不是真的就因为隔绝而真正产生冷漠？总有一种给他们找下台阶下的错觉。

社会学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史料的缺乏使得部分结论无法说服我。翻译照搬英文句式，支离破碎。

所谓暴行不是一个人，亦或是一群人，是所有人。今日言之灼灼的良善，在某种诱因下，某种契机时也许是来自地狱的撒旦。。。

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现代性要素，使得大屠杀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这本书是鲍曼分析the Holocaust的一本著作。其实前六章大多集中在分析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大屠杀很明显是蕴含在现代文明之中的另一面，而非是被现代性压抑了的非理性。其实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第七章，鲍曼在这里尝试探讨了道德的社会学起源。他一开始先挑战了某种过往社会学对道德的循环论证，进一步，他尝试提出道德并非是和社会一体的，而是某种“前社会存在”。这里出现了萨特和列维纳斯的观点，从萨特构建出一个无处不在的“自我--他人”关系到列维纳斯“我们为一切负一切责任”这样的分析中，(P234-240)道德优先于利益要求，因此可以简单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总之，我认为最精彩的其实在全书的第七章以后的内容。

翻译真烂。好多错误。

警察只是按要求训诫，主播只是按稿子播报。翻了书后的题识，2013年2月17日在家读完的。那时候还没用豆瓣。

经典社科名著阅读系列2。

即使前四章翻译莫名其妙，也仍不失为一本杰作。

[现代性与大屠杀 下载链接1](#)

## 书评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开篇就提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单单只被看做是犹太民族事件，或是“欧洲基督教徒反犹顶点”这类单元素的集合，因为这样它便不具

备社会学意义。同时，大屠杀也并非人们优化的期望是一种广泛而常见的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一个具有“回复性” ...

前几节将大屠杀研究的几个基本的论点结合史料都说的挺详细，算是这方面理论的“集大成”。可惜后两节加上那篇发言稿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简直是terrible，而且那种方案不但不会遏制道德的无王状态（见发言稿）反而会助长“以理杀人”这种大屠杀模式。本书前几节略述如...

### 读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本来是一篇作业，现在也就直接复制粘贴，带着浓厚的学院风，而且写得也不咋样，不过自认虽然啰嗦了一点，对文章的思路梳理地还是挺清楚的，大家且凑合着看呗。鲍曼以严谨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

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不管是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从中国的《春秋》，都写的是战争，有战争就离不开屠杀，可以肯定的说战争是人类族群之间对争议难以协商解决后最激烈的反应，关于杀戮对我们人类来说，可以说是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的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了，其虽违背人类追求...

如果说大屠杀的造成是由于理性制度的衍生物而来，譬如与受害者的隔离、技术化、官僚组织运作等等，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同样这般冷漠的理性制度来给予众人幸福，其实也是一种徒劳与妄想？进而言之，不论是怎样的制度，奴隶的、君主的、民主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只...

如果问你：大屠杀离你有多远？答：“电影？小说？”“恐怖片？”“你是说二战吧？”也许你还会暗笑这个问题的荒谬可笑。我们印象中的屠杀也许是古代君王开疆拓土的野蛮行径，也许是人类与自然抗争打猎维生，它们充其量出现在千年前历史的书页上，现代生活理性而发达，又...

## 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一期沙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讨论纪要

时间：2018年6月3日星期日 15:00-17:30 地点：梅园书房

6月3日下午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的首场活动在梅园书房举行，由来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杨渝东老师为大家带来《现代社会的困境：鲍曼的社会学路径》的学术分享。...

-----  
这是一本警世之书！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故意忽视的真实，大屠杀就像我们去吃麦当劳一样菩提，是普通人普通事件的特殊聚合而形成的，但也是我们不断地故意遗忘的真实。  
齐格蒙·鲍曼教授的学术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这本警世之书。思考...

-----  
近現代人類的發展建立在相信理性全能的基礎上。個人認為，這種理性大多指稱的是工具理性。啓蒙思想家們認為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由利用自然而來。事實上，利用自然需要的是工具理性，用工具理性對自然進行程序化操作，便可使自然為我所用。在這個過程中，人成為...

-----  
文明的指向。文明指向哪里，哪里就要连根拔起，至少我们要看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屠杀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理性官僚制、科学技术与工程、责任制、纪律性..至少这些还是我们追求的..大屠杀的起源有着悠久的渊源，伴随着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歧而来，这种伴性构成了基督共...

-----  
大屠杀作为近代历史中最为深刻的一次集体记忆，惊动着所有人的同情心与羞耻心。而随着时间的流动，大屠杀记忆的深刻性正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大屠杀逐渐成为德国人与犹太人的独特历史，渐渐远离我们的当下生活。正是由于遗忘敌不过时间的洗刷，而大屠杀也渐渐被理解为历史的一...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加诸犹太人身上的暴行起初不为人知，后来逐渐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大屠杀”（Holocaust）——予以界定，仿佛其他的词汇都无法彰显这种暴行的史无前例和骇人听闻，至少犹太人和部分学者这般认为。不管大屠杀是否独一无二，必须承认的是，大屠杀...

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的屠杀事件：1915前后发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达到一百五十万之众；1936-1938年的苏联大清洗屠杀了六十八万至一百三十万左右的苏联人民；1937年12月-1938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军民惨遭屠戮；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屠杀了...

诺齐克在《苏格拉底的困惑》中提到纽康姆悖论，结论是要两个箱子都拿，因为他提出，要么是“逆向因果”，你后来的决定，决定了当初欧米伽是否往第二个箱子里放了百万美元。这个逻辑是，你决定拿第二个箱子，那么就放了钱；你两个都拿，就没放。如果是这个逻辑，那么你就只能选...

[现代性与大屠杀](#) [下载链接1](#)